

非洲昏睡病历史研究

于红

【内容提要】 昏睡病是自远古以来就肆虐于非洲大陆的热带传染病,严重阻碍了非洲农业、畜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非洲历史的演进。本文概述了非洲社会控制自然生态系统以阻止昏睡病传播、蔓延的社会机制,并评析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生态系统的影响,指出殖民主义入侵引发的巨大震荡和冲击破坏了非洲人抵御昏睡病威胁的社会机制,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导致了昏睡病的大规模爆发与流行。

【关键词】 非洲 昏睡病 采采蝇 殖民主义

【作者简介】 于红,1972年生,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通信地址:北京大学25楼136#;邮编:100871。

昏睡病是由采采蝇传播的热带传染病,自古以来就在非洲大陆上肆虐,成为阻碍畜牧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非洲历史的演进。在漫长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非洲社会在逐渐了解人类、家畜、野生动物、采采蝇、灌木丛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机制,有效地阻碍了昏睡病的传播、蔓延。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非洲社会控制生态系统的机制,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昏睡病成为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在非洲广大地区大规模地爆发、流行。许多学者都探讨了殖民主义与昏睡病的联系,玛丽妮·莱昂斯就将昏睡病称为“殖民主义疾病”¹。研究昏睡病在非洲的传播、影响及非洲社会对它的反应是非洲疾病医疗史、生态史、社会史的重要课题,并有助于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对于探讨如何阻止非洲生态环境的恶化,建立起适应非洲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增长机制,特别是迎接艾滋病的严峻挑战,都不无借鉴意义。

—

昏睡病是由一种寄生虫——锥体虫(Trypanosome)引发的传染病,采采蝇是锥体虫的主要

传播媒介。采采蝇通过吸血将锥体虫注入人或动物的血液中,使其感染昏睡病。野生动物是锥体虫的主要寄主,但由于它们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适应了锥体虫,因而并不表现出昏睡病症状。但对于人和牲畜来说,昏睡病常常是致命的。人类昏睡病特征表现为抽搐、发热、淋巴结发炎及脑脊髓受侵导致的深度昏睡。

采采蝇目前仅存于非洲大陆,主要分布在南纬和北纬14度之间的地区。但在远古时期,采采蝇的分布不只限于非洲。由这种飞蝇引发的昏睡病很可能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了大群野生动物的灭绝,从而为灵长类动物离开森林地带,在草原上进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与采采蝇的密切接触也导致了早期人科动物的极高死亡率,这也许是某些人科种属退化、消失的原因。^④

“假如非洲大陆一直没有采采蝇,非洲的历史便大不一样了。”^(四) 首先,飞蝇的猖獗成为发展畜

¹ John Ford, *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es in African Ecology: 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1; Helge Kjekshus, *Ecology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n History: The Case of Tanganyika 1850-1950*,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7; John Biffe,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ryinez Lyons, *The Colonial Disease: A Social Histor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Northern Zaïre, 1900-19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Frank L. Lambercht, *Aspects of Evolution and Ecology of Tsetse Flies and Trypanosomiasis in Prehistoric Africa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5(1964), pp. 76-78.

(四) J·基-泽博编:《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252页。

牧业的巨大障碍,致使较大牲畜根本无法到达定居的农业群落地区,限制了犁耕、厩肥和轮车的使用,极大地阻滞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坦噶尼喀地区地图册》认为,“在任何存在采采蝇的地方,人们都不能畜养牛或其它牲畜。”¹英国昆虫学家S·纳皮尔·巴克斯称,“牛的分布成为表明哪里存在或不存在采采蝇的极好指示标,哪里没有牛,哪里就有采采蝇。”^④20世纪初期,“采采蝇是热带非洲发展的最大威胁”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四)其次,采采蝇对非洲人口迁徙、分布产生了很大影响。牲畜所有者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其畜群在穿越采采蝇肆虐的地区时会遭受严重损失。因而,畜牧部落的迁徙必须经过没有采采蝇的天然走廊或人口密集的农业区群落建立的无蝇地带。约900年前,牲畜所有者的迁徙以及同其他民族的混合产生了今天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人和胡图人社会。^{1/4}

然而,约翰·福特在其研究昏睡病的经典著作《昏睡病在非洲生态中的角色》中,对采采蝇成为开发、利用非洲广大地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论断提出了挑战。詹姆斯·吉伯林对坦桑尼亚北部地区昏睡病历史所做的个案研究支持了福特的观点。它表明采采蝇并未阻止人们占据土地及饲养牲畜。^{1/2}采采蝇对非洲历史影响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非洲和西方学者关于昏睡病的研究都表明前殖民主义的非洲社会已逐步积累起关于昏睡病与采采蝇的知识,并建立起抵御昏睡病威胁的社会机制,通过人为地控制自然生态系统,调节人类、牲畜、野生动物、采采蝇、锥体虫的相互关系,成功地与昏睡病共存。

坦桑尼亚历史学家科杰克苏斯对19世纪东非生态、人口、经济状况的研究详细阐明了非洲社会如何实现生态控制,避免了采采蝇对农业、畜牧业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

中非和东非探险者的报告表明,当地人认识到采采蝇主要栖息、出没于灌木林中,以吸食野生动物的血液维生。他们通过清理灌木丛、捕杀野生动物将采采蝇限制在特定区域。早期的农业拓荒者通过焚烧清理出土地,把野生动物及与之相伴随的采采蝇孤立于缺乏吸引力的丛林和贫瘠的地区,这些地区构成了族群与部落定居的界限。

畜牧者利用清理出的土地来放牧牛群,大片土地随之被置于永久的控制之下。有证据表明,19世纪的东非远非野生动物的天堂。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扩展,野生动物逐渐灭绝。用于打猎的火器的引进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惟有未被清理的地区成为野生动物的避难所。尽管仍有大片土地处于蛮荒状态,但由于非洲人居住地总是在水源附近,因而即使是广泛分散的人类居住地也能对周围的野生动物产生很大影响,迫使其数量下降,起到与直接控制野生动物异曲同工的作用。^{3/4}野生动物的数量被控制在与人类扩展和经济开发相适应的水平上。

畜牧者知道灌木林是采采蝇滋生的地带,因而避免在这些地区放牧。在发生旱灾时,畜牧者也会将牛群赶到飞蝇出没的灌木丛,以避免畜群的灭顶之灾。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非洲人积累起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将采采蝇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的知识。他们发现让牛群在夜晚活动是相对安全的措施。此外,在牛群于白昼穿越采采蝇地带时,他们将人类的排泄物或狮子的脂肪涂抹在牛身上,以起到防护作用。焚烧晒干的牛粪产生的浓烟也会提供一定的防护。夜行与烟熏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中非、东非和南部非洲各地,畜牧者借此将牛群运送到沿海地区。除了防护措施,一些部落还尝试对患昏睡病的牛进行治疗。他们将树根的皮与干燥的采采蝇研成粉末,让病牛内服,并焚烧采集的植物,对牛进行烟熏。这种治疗在表现出疾病症状的几个星期里连续进行。^⑧

科杰克苏斯认为,前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人成功地使广大土地免受采采蝇之害,而如今这些地区却已被飞蝇侵入。詹姆斯·吉伯林对科杰克苏斯的论述提出批评,认为他仅仅强调了非洲社会避免与采采蝇接触的能力,将其作为抵御昏睡病的关键所在;他立论所援引的采采蝇分布图是不精确的,因而低估了采采蝇带的范围。吉伯林

¹ Helge Kjekshus, op. cit., p. 51.

^④ Juhani Koponen, *People and Production in Late Precolonial Tanzania: History and Structure*, Finland: Gummerus Kirjapaino Oy, Tyvaskyla, 1988, p. 249.

(四) Helge Kjekshus, op. cit., p. 51.

^{1/2} J·基一泽博,前引书,第252页。

^{3/4} James Gblin, *Trypanosomiasis Control in African History: An Evaded Issu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1(1990),

^{3/4} Helge Kjekshus, op. cit., p. 49.

^⑧ Helge Kjekshus, op. cit., pp. 52-54.

指出,事实上,非洲社会的生态控制机制比科杰克苏斯描述的更为复杂,他没有充分认识到非洲人抵御昏睡病所取得的成就。¹

约翰·福特认为,非洲人并未彻底消灭采采蝇,而是通过清理灌木林、猎杀野生动物等生态控制手段,使采采蝇的密度限制在较低水平上,因此大大降低了昏睡病的传染性。与此同时,人和牲畜与飞蝇并未完全隔离,而是保持着持续性接触,从而获得抵御昏睡病的免疫力。

近年来兽医学、寄生虫学及免疫学等领域的研究趋向于支持福特的观点。穆利等人认为对昏睡病的适应性(Trypanotolerance)是与生俱来的,并可能作为一个主导性特征而遗传给后代。他们称能够在非洲几个种类的牛、山羊和绵羊以及许多种野生动物,或许还有人的身上确认这种抵抗昏睡病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指出牛能够通过感染锥体虫的途径获得或提高抵抗力,即使是不具备遗传性免疫力种类的牛也是如此。关于遗传性及获得性昏睡病免疫力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实验结果的验证,被日益接受。这些实验还证明:(1)只有将牛持续性地暴露于锥体虫的感染之下,才能使其保持抵抗昏睡病的能力;(2)牛拥有的抵抗力在感染大量锥体虫的情况下消失。^④

詹姆斯·吉布林对坦桑尼亚东北部乌兹瓜地区所做的个案研究与福特的观点更为吻合。这一地区临近穿越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采采蝇肆虐区。农耕者通过焚烧及砍伐来控制适宜野生动物及采采蝇生活的植物群。由于降水稀少且不稳定,人们不能占据大片林地,只有少数拥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有稠密的人口和较多的牛。在这里,采采蝇的存在并未阻止人们饲养牛,尽管它使牛的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饲养牛的最大障碍与其说是飞蝇,不如说是缺水,因为这阻碍了人口的定居及对环境的社会控制。由于采采蝇的猖獗,人和牛都不可能避免与其接触,人们到林地中狩猎、采蜜或收集木柴及建筑材料,而牛群也在旱季时被赶到林地中放牧。看起来人畜与飞蝇周期性、有限的接触使其保持了对昏睡病的抵抗力。

福特的观点并不是最终的定论,它有待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领域新进展、新发现的验证或修正,也许它会被未来提出的新理论所取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的确

存在着控制生态环境的社会机制,它的有效运作使非洲社会能够与采采蝇长期共存,避免了昏睡病的传播和蔓延。

二

殖民主义的入侵打断了非洲的自然历史进程。军事征服、殖民统治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引发了非洲社会的剧烈震荡。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与结构的解体,战乱与饥荒频仍,导致了某些地区人口大量减少,这使得非洲人长期建立起来的生态系统社会控制机制趋于崩溃,抵御昏睡病的能力降低,其后果就是采采蝇的感染区急剧扩大,人类及牲畜的昏睡病大规模地爆发与流行。它对非洲社会造成的灾难与恐慌比之今天的艾滋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01至1905年的5年间,英属乌干达保护国约有25万~30万人死于昏睡病,原来人口稠密的布苏加地区因此失去了2/3的人口。^④在非洲的许多地区,牛马等大牲畜大为减少,几近绝迹。在采采蝇的蔓延及昏睡病的传播过程中,殖民政府的某些政策,如建立国家公园,保护野生动物及强迫劳工制度,征收橡胶税等,直接加重了疫情。生态灾难成为殖民主义对非洲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

科杰克苏斯的著作及历史学家约翰·艾利夫的《坦噶尼喀现代史》都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坦桑尼亚的生态灾难,并肯定了它与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19与20世纪之交的坦噶尼喀,人为控制的生态系统崩溃,生活在林地草原地区的人们遭受了破坏庄稼的野猪与狒狒的祸害。不久以后,狮子等猎食动物增多,迫使人们从林地边缘地带撤离。被抛弃的田地变为灌木丛,很快就被采采蝇侵入。人和牲畜开始死于昏睡病,不得不再度后撤。野猪、狮子、灌木与采采蝇接踵而至,原来部落之间狭窄的边缘荒野地带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据德国人在1913年估计,德属东非有1/3的地区感染了采采蝇。昏睡病迅速发展成为流行

¹ James Giblin, op. cit., p. 67.

^④ James Giblin, op. cit., pp. 64-65.

^④ Maryinez Lyons, op. cit., pp. 70-71.

病,1909年维多利亚湖周围有1405例,1913年坦噶尼喀湖周围有3300例。¹

19世纪末叶的人畜流行病的爆发与欧洲殖民者有直接关系。

首先,残暴的殖民征服与殖民统治使东非人民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反抗殖民入侵的斗争几乎波及整个德属东非地区,最终导致了1905~1907年声势浩大的马及马及起义的爆发。为了对付非洲人的游击战,德国军队实行焦土政策,制造人为的饥荒,并屠杀无辜百姓。戈瓦萨博士估计死于马及马及起义及其影响的人数为25万~30万,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3,其中大部分人死于饥荒。^④当幸存者返回家园时,他们发现森林蚕食了农田,野生动物占据了耕地,采采蝇也同时出现。

其次,殖民统治者的劳工征募政策造成坦噶尼喀“到处可见半空、衰败的村庄,到处都是从前耕种的迹象。”当劳工们在殖民者的种植园耕作时,灌木和采采蝇侵占了他们在家乡被弃置的田地。

再次,殖民统治改变了非洲人的居住方式,加剧了采采蝇的传播。在殖民者到来前,人们住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大型村庄里,以防范部落战争及掠奴者的威胁。核心村庄人口稠密,四周围绕着清理出的土地,有效地抵御了采采蝇的滋扰。人们在这些避风港里进行农耕并饲养牲畜。在殖民战争中,德国人凭借先进武器摧毁了防御工事。为了逃避税收及劳工征募,坦噶尼喀人建立了小型村庄,并扩散进灌木林中,这使得他们暴露在飞蝇的攻击下,无法饲养牲畜。

最后,殖民者保护野生动物的政策瓦解了19世纪非洲人控制野生动物的机制,导致了采采蝇的进一步扩展。1896年5月,德国人颁布法令建立了两个狩猎保护区,并引入了狩猎许可证和枪支执照制度。这虽未完全将非洲人排除在狩猎活动之外,但狩猎逐渐成为欧洲人的特权。1908年11月的狩猎法进一步增加了保护区的数目。英国人在坦噶尼喀的殖民统治总体上也倾向于保护野生动物。他们建立了一些大型的野生动物和森林保护区,并更严格地限制非洲人狩猎。野生动物的繁盛使其与人类社会的接触增多,从而增加了与野生动物伴随而来的采采蝇与昏睡病的

威胁。

殖民统治者往往对非洲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抱有偏见,这种偏见也反映在他们对采采蝇问题的态度上。殖民者认为非洲人是懒惰的农民和牧人,正是他们引起了土壤的侵蚀、水的短缺及普遍性的土壤贫瘠。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些人认为也许采采蝇带的扩展并非坏事。“动物的昏睡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灾祸”,“土壤侵蚀尽管最近才成为新闻,但它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热带非洲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在对付土壤侵蚀的斗争中,没有什么比采采蝇所做的更为有效”。^④

玛丽妮·利昂斯对于20世纪上半叶北扎伊尔昏睡病的社会史研究也揭示出,比利时殖民者的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是导致昏睡病的根本原因。利昂斯在著作中多次强调了昏睡病与身体抵抗力之间的联系,指出感染昏睡病并不是仅仅被采采蝇叮咬那么简单。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免疫机能以及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决定他对昏睡病抵抗力的关键所在。^{1/4}在比属刚果主持治疗昏睡病的医生也注意到,地理及社会状况与昏睡病有相关关系。他认为充足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能够极大地增强对昏睡病的抵抗力,并指出控制昏睡病不应当仅仅是消灭采采蝇,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状况是最好的治疗之一。^{1/2}

从19世纪晚期开始,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殖民战争给今苏丹南部、刚果(金)北部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浩劫。它所引发的触目惊心的贫困导致了非洲人严重的营养不良及对疾病抵抗力的降低。著名历史学家范西纳曾这样描绘殖民征服给扎伊尔北部居民带来的巨大社会创痛:“在赤道省(扎伊尔人)的记忆中,刚果自由邦的时期是战争的年代,白人是国家的摧毁者,正是他们带来了昏睡病。”^{3/4}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对劳工无止境的需求及繁重的税收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饥荒与营养不良进一步导致了非洲人体质下降,对昏睡病的抵抗力减弱。

¹ John Iliff, *op. cit.*, pp.163_164.

^④ John Iliff, *op. cit.*, pp.199_200.

^④ Helge Kjekshus, *op. cit.*, p175.

^{1/4} Maryinez Lyons, *op. cit.*, p.47.

^{1/2} Maryinez Lyons, *op. cit.*, p.120.

^{3/4} Maryinez Lyons, *op. cit.*, p.12.

殖民地征收的橡胶税与昏睡病有直接联系。一个非洲人通常需要 22~ 25 天来完成定额。他们不得不到离家很远的林地中寻找野生的橡胶树, 这使他们不仅遭受极大的辛苦和严重的食物匮乏, 而且直接暴露于采采蝇的攻击之下。¹ 一战时期橡胶价格上涨更刺激了殖民当局的贪欲, 进一步增加了非洲人的负担。1917 年伯尔川德认为收集橡胶也许已成为昏睡病传播的主要因素。^④

殖民入侵与采采蝇的传播及昏睡病的爆发和流行之间的联系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但正如沃勒对肯尼亚的西纳鲁克地区进行的研究^④所揭示的, 自然生态属于历史发展中的长时段因素。在遥远的过去, 非洲自然生态系统也许经历过相似的变化周期。前殖民时期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结构, 它必定也经历过危机。热带非洲的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弹性和适应性, 它能够消化一系列的变化与压力, 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动荡与调整后, 达到新的平衡, 只不过这种新的稳定与平衡也许有别于先前的模式。此外, 我们还应注意到, 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非洲各个地区差异很大, 因而不应当把 19~ 20 世纪之交非洲的生

态危机简单地全部归咎于殖民主义, 夸大其影响, 而应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察与分析各个地区生态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运作机制。

“正如昏睡病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 它也将是非洲未来的一部分。”^{1/4} 对昏睡病的研究表明, 除了通常采用的化学治疗和杀虫剂外, 控制昏睡病还有其他途径与方法。对于非洲生态环境及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控制采采蝇及昏睡病的历史经验的考察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更具有现实意义, 它也许能够有助于目前仍面临昏睡病威胁的非洲国家找到适合其现实情况的防治措施, 并为迎接艾滋病的严峻挑战提供宝贵借鉴。

(责任编辑: 艾迪; 责任校对: 徐拓)

¹ Maryinez Lyons, op. cit., p. 33.

④ Maryinez Lyons, op. cit., p. 35.

④ Richard D. Waller, *Tsetse Fly in Western Narak,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5(1990), pp. 81- 101.

^{1/4} Frank L. Lambercht, op. cit., p. 95.

资料库

西亚非洲研究所历史沿革

西亚非洲研究所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 1961 年 7 月 4 日成立的, 原名亚非研究所, 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创建时的所领导人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张铁生先生。1964 年亚非研究所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 由吴学谦先生和张铁生先生共同领导西亚非洲研究所。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研究所停止业务活动。1974 年部分恢复研究工作。1978 年研究所正式恢复, 由著名政治理论家廖盖隆先生任所长。从 1985 年至 1992 年, 葛倩女士任所长, 后由赵国忠先生继任(1993~ 1998 年)。现任所长是杨光先生。

(艾迪)

AIDS: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Zhan Shiming

pp. 40~ 45

Africa has been the biggest victim of AIDS since this infectious disease becomes popular in the world in more than 20 years. The wide spread of AIDS in Africa has its spe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s formed vicious circle together with many innate problems. AIDS has not only damaged people's body and life, but also

influenced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d social crisis, and brought about new unstable factors. Only through the common endeavor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n the serious spreading trend of AIDS be really held back in Africa.

A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s Sleeping Sickness

Yu Hong

pp. 46~ 50

Sleeping sickness is a kind of tropical infectious disease, which has been running wild in Africa since remote ancient times. It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indu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also deeply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African history.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social mechanism that African society has used to control the natural ecosystem in order to check the spread of sleeping

sick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colonialism on African ecosystem,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big shock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colonialism had destroyed the social mechanism African people used to resist the threat of sleeping sickness, brought about an unprecedented ecological disaster,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eruption and widespread expansion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Africa at a large extent.

The Pioneer of African "Ethno-philosophy" Study

——Interpreting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Alexis Kagame

Zhang Hongming

pp. 56~ 61

Rwanda scholar Alexis Kagame, who enjoyed great prestige of being "father of ethno-philosophy" in Africa, was the earliest African philosopher who studied African philosophy from the angle of ethnology.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Kagame's research method and hi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Bantu philosophy study, such as the definition, sources, contents and nature of Bantu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艾迪; 责任校对: 艾迪)